

新华全媒头条

# 追寻『红色国际桥梁』

## 亚欧大陆桥上的百年交通线

新华社呼和浩特5月12日电(记者于长洪、胡晓光、丁铭、魏婧宇)在亚欧大陆桥上,曾有一条秘密的红色交通线,从“东亚之窗”满洲里通向莫斯科。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这条交通线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建立起联系,探寻救国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一批批革命者的后代沿着这条交通线返回祖国,投身到新中国建设事业中。

共建“一带一路”,百年交通线换了角色,成为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通道。

时光荏苒,这条“国际桥梁”承载着“救中国”的历史风云,更凸显出“强中国”的现实风景。

### 交通线的“秘密”

1924年6月的一天凌晨,3辆马车从满洲里一家小旅馆出发,直奔国境线的方向。天光微明,12匹膘肥体壮的快马分别拉着3辆车奔驰,“哒哒”的马蹄声回响在旷野中,惊动了执勤的东北军哨兵。顷刻间,枪声、车轮声、马蹄声汇成一片,赶车人熟练地操纵着马缰绳,左躲右闪避开纷飞的弹雨。

车上坐着李大钊和其他5位代表,在地下交通员的帮助下,他们有惊无险地越过国境线,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为加强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联系,开辟了多条国际交通线。”满洲里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徐占信说,“其中经满洲里出境前往莫斯科的交通线是形成时间较早、持续时间较长的一条线,被誉为‘一座红色的国际桥梁’。”

晋丰泰杂货铺、承和顺估衣铺、苏侨修鞋铺……翻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满洲里地图,一个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地点,却在历史长河中闪闪发光,这些都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设立的地下交通站。

从1920年开始,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相继在满洲里设立了十几个秘密交通站。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出席共产国际会议、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被派往苏联学习工作等,都通过满洲里这条交通线进出中苏边境。

“陈独秀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李大钊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都是经过满洲里秘密交通线出境的。”徐占信说,“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迅速传播的过程中,满洲里的秘密交通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莫斯科郊外的五一村,绿树掩映着一栋白黄相间的三层建筑。1928年,中共六大在此召开,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1928年4月开始,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陆续从国内出发,乔装成教师、商人和游客等,换乘各种交通工具秘密前往莫斯科。国内出发的代表中,有一多半经满洲里出境。

中共六大代表罗明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和另一位代表许士森来到满洲里后,先乘马车到了中苏边境一个山地,然后趁着夜色爬山过边境,许士森当时患有肺病,为了不被发现,一路捂着忍着咳嗽。前往莫斯科的路上,许士森病情加重,最终在莫斯科医治无效病故。

罗章龙、张昆弟、黄平等代表则是分批从满洲里乘马车过境。他们在哈



满洲里红色展览馆内的秘密交通站照片(资料图)。新华社记者达日罕摄

尔滨六大代表接待站领到一个过境的号码牌,然后乘火车到满洲里,下车后找到车灯上写着同样号码的马车,将号码牌交给苏联马车夫,车夫就会将他们送出境外。

在地下交通站的帮助下,还有的代表躲在草料车上狂奔出境、有的在浓雾中沿着铁路线走着出境……

跨越千山万水、不惧艰难险阻,没有什么能阻挡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救国之路的脚步。

位于满洲里三道街的晋丰泰杂货铺,是红色交通线上重要的地下交通站。“杂货铺一共四间房,后面是个大杂院,院里有两个储白菜的地窖可以藏人,杂货铺里还有个小地窖,来不及跑也能躲在里面。”86岁的杨文华,仍能清晰回忆起小时候生活过的晋丰泰杂货铺。

杨文华的父亲杨永和从1934年开始负责晋丰泰的地下交通站工作,母亲林凤珍则带着她和姐姐为父亲的工作打掩护。

1937年,满洲里的共产党地下联络网络遭到日本宪兵队破坏,杨永和一家被捕入狱。“中国人不怕死、不怕苦,不会在敌人面前低头。”杨文华回忆说,“母亲在狱中遭受严刑拷打,没向敌人透露任何信息。”杨文华母女三人后来被释放,但却和父亲断了联系。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母女三人回到满洲里,盼着与杨永和团圆。“又找了两年多,才知道父亲早已被杀害。”

1920年至1937年,经满洲里出境的红色交通线存在了18个春秋。交通线被破坏后,多数交通员被捕牺牲。因为他们工作隐秘,多数人没有留下姓名,甚至家人在很久后才得知消息。

### 莫斯科郊外归来

1950年7月底,一列苏联火车

缓缓驶入满洲里火车站。

车门打开,30多名孩子冲上站台。12岁的柴娥丽、13岁的肖苏华和14岁的李多力在孩子堆中好奇地四处张望,他们回到了从未谋面的祖国。

这批孩子多是在苏联出生、长大,他们的父辈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者。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众多革命先辈沿着亚欧大陆桥的红色交通线前往苏联工作学习;多年后,他们的后代踏上父辈走过的路,回国投身到新中国建设的各项事业中。

柴娥丽的祖父是东北抗日联军烈士,父亲在晋察冀战役中牺牲。“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牺牲了,但我是党的女儿,从不觉得自己是孤儿。”柴娥丽说。

1966年,柴娥丽从当时的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毕业,开始从事机械汽车等进出口工作,见证了国家工业贸易的发展。柴娥丽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苏联、日本进口汽车、工程设备产品,觉得都特别先进,到了80年代末,国内的工厂陆续发展起来,街上出现了很多国产车。”

“我一辈子做进口贸易,直到90年代初退休之前的那几年,终于开始搞出口了。”柴娥丽开心地说,“现在国家的制造业发展越来越快,出口的产品比我们那时候多多了。”

85岁的李多力回顾自己的一生,将1961年列为最重要的一年。那一年,他从当时的北京工业学院转学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并在学校光荣地入了党。

李多力考入北京工业学院后,先在坦克专业学习,后来学校将他调入新成立的固体燃料专业,1961年他转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又转去学习液体火箭发动机。“我就想了国防建设学本领,国家需要我学啥,我就学啥。”

李多力说:“那时国家的导弹研究刚刚起步,有些课程还没有教材,我买了不少关于火箭发动机的俄文书学习。”1964年毕业后,李多力开始参与液体火箭发动机的制造工作,直到1991年退休。

1936年,肖苏华的父母从满洲里出境,沿红色交通线秘密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7年,肖苏华在莫斯科出生,父母还没来得及给他取名字,就赶回国内投身革命事业。在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大家都叫肖苏华“李志·维佳”,这是用父亲的化名和他的小名拼起来的名字。直到回国后,十几岁的肖苏华才有了正式的名字。父亲为他取名“苏华”,象征中苏间的友谊。

在苏联生活期间爱上芭蕾舞的肖苏华,回国后继续从事芭蕾舞的教学与研究,并常年致力于中西方的舞蹈交流。他融合红楼梦、白蛇传、三星堆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创作舞剧舞蹈作品,将中国风格的舞剧推向世界舞台。

和李多力、肖苏华等一起在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长大的肖立昂,回国后成长为我国第一批水下摄影师。他说:“我们都是革命的接班人,不管干什么工作都要求自己兢兢业业,把祖国建设得更好。”

### 向北开放桥头堡

2009年,李多力时隔59年再次回到满洲里,眼前的城市令他感觉陌生又激动。

矮小的火车站、稀松的小平房、成片的庄稼地……这是李多力1950年回国时,满洲里留给他的印象。

繁忙的国门口岸、高楼林立的现代街区、络绎不绝的中外游客……曾经的“红色桥头堡”满洲里早已变了模样,当年的“红色交通线”如今成了亚欧经贸往来的通道。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大批物资通过满洲里运往国内,有力支援了国内建设和抗美援朝。王同月老人在1954年进入刚成立的满洲里铁路换装处工作,负责出入境物资的装卸,亲身经历了那个中苏铁路运输的繁忙时期。他曾回忆说:“票房以北是苏联车,以南是中国车,轨道上的车都是满的,我们1000多名换装工人,每天三班倒,不停地装运物资。”

半个多世纪以来,满洲里一直是国际铁路运输的重要枢纽,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东亚之窗”满洲里带来了新的使命与机遇。

悠扬的汽笛声响起,一列满载

货物的中欧班列缓缓驶出国门,沿着亚欧大陆桥驶向欧洲。满洲里已成为中欧班列东部通道的重要口岸,经由满洲里铁路口岸进出境的中欧班列运行线路已超过50条。

在全球疫情下,航空和海运出现不同程度停运、减运等情况。中欧班列发挥安全高效等优势,不断开拓新业务,增添新线路,为保障中欧及沿线国家物流畅通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年,经满洲里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达3548列、324310标箱,较上一年同期分别增长35.1%和37.6%。

火车驶出满洲里,进入俄罗斯罗斯塔,这里曾是中共六大代表从满洲里秘密出境后的第一站。如今,赤塔地区积极开发“红色旅游”资源,与内蒙古自治区共同开展跨境旅游。

“俄中边界全长超过4000公里,很利于两国增加和发展经济协作。”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人工智能、神经技术和商业分析实验室主任铁木尔·萨德科夫说,“我们将打造互利合作的典范,深化‘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推动经贸投资合作提质升级,同时拓展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

当前,中俄贸易往来依旧密切。海关总署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一季度,中俄贸易额同比增长15.4%,达到292.65亿美元。

俄中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主席、负责保护企业家权益的总统全权代表鲍里斯·季托夫说,俄中在合理的互利原则基础上发展经贸合作,按计划,到2024年,两国将把双边贸易额提高到2000亿美元。

季托夫指出,有必要提升中小企业在双边贸易中的份额,更加积极地安排成千上万俄中企业家相互往来。

张志强是满洲里一家商贸企业的负责人,20世纪90年代初,他和妻子背着背包往返中俄两国,进行小商品贸易,后来生意越做越大,成立了商贸公司,代理出口农业机械、工程设备等大宗商品。“现在交通联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中小企业开展对外贸易得到的支持和便利越来越多。”

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俄中研究中心主任叶甫盖尼·扎伊采夫说:“我认为俄中合作禁区 and 上限是不存在的。因为把我们两国团结在一起的不仅是这种现实的、务实的双边经济利益,还有我们对时代大多数现实问题观点一致。”

亚欧大陆桥上的交通线,运送到探索救国道路的革命者,接回了革命者后代建设祖国,又为新中国建设输送过重要物资,如今成为人流、物流、信息流通道,承担起更丰富的发展任务。

## 追访欧洲红色足迹

# 中国元帅在德国小城的那段生活

## 探寻朱德在哥廷根的足迹

德国中部城市哥廷根,5月的樱花在历史悠久的哥廷根大学校园里绽放,学生们脚步匆匆。

1923年,朱德来到这里学习生活。

见证军阀混战、国弱民贫、列强欺凌,在那个觉醒年代,朱德试图探寻一条新的救国救民道路。他在海外坚定了自己理想信念的基石,在马克思的家乡德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历数十年艰苦革命洗礼,他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中国十大元帅之首。

在中共建党百年之际,新华社记者专程前往哥廷根探寻朱德在德国留下的足迹。今日翻开古城的档案,走访故居,仍可以依稀还原出这位建国元勋彼时的风发意气。

### 求学

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内至今仍保留着朱德的注册簿,纸张微微泛黄,字迹仍清晰可辨。1923年的学生注册簿中,其中一页的下方是朱德用德语亲笔填写的注册信息,包括“姓名朱德”“住所普朗克街3号”“来自中国四川省”等相关内容。

在哥廷根市档案馆,历史学家罗尔夫·科尔施泰特在一大摞有关中国留学生的材料中,也翻出了一张泛黄的登记卡。

登记卡左下方是朱德的照片,骑缝盖着“哥廷根警察局居民登记处”的蓝色印章。朱德身穿西装,系着领带,浓眉下双目炯炯有神。

不同于一般的留学生,远赴重洋前,丰富的人生阅历已让朱德告

别稚嫩:清朝光绪年间生人,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

科尔施泰特说,上世纪20年代,不少中国留学生来到哥廷根租住在市区。朱德留学时已年近40岁,从戎多年,他在这里拓展了视野,了解了西方工业国的情况。

### 革命

朱德的登记卡上记录了两处住址。初到哥廷根,他住在文德·朗特路88号,约5个月后至普朗克街3号。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原居留地一栏内,写的是“柏林,维尔默斯多夫”,这是周恩来曾在柏林居住的地区。

1922年,朱德在柏林与党海外早期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负责人的周恩来相见。朱德表达了加入共产主义组织的强烈愿望。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朱德当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履历丰富、社会声望较高的朱德寻求加入党组织,一方面是他的历史自觉,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正如磁石一般吸引着进步青年。

今日回到哥廷根城东的普朗克街3号,仍可以看到朱德居住过的二层红色砖房。墙上嵌有一块精致的大理石纪念牌匾,上面用德语镌刻着:“朱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23-1924”。

1986年,朱德100周年诞辰之际,哥廷根市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挂牌仪式,市长亲自为纪念牌匾揭幕。

这里或是朱德彼时生活的圆心,也是朱德的“革命办公室”。据档案记载,朱德在课业之外组织、参与了不少社会活动。

记者从市档案中调出了哥廷根中国学生会向警方申请一次游行示威的



这是四月十六日在德国哥廷根拍摄的普朗克街三号朱德故居。新华社记者单宇琦摄

相关文件,包括哥廷根市警察局当时对传单审查后的存档。传单是一份蓝色封皮的小册子,题为《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介绍了“五卅惨案”及其发生的历史背景,阐述了中国人民反帝反殖民斗争的意义。

在德期间,由于参加声援“五卅惨案”后上海罢工等革命活动,朱德曾两次被捕。1925年,因形势变化,他被迫离开德国,前往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他返回中国。

### 启迪

今日哥廷根大学中国学联的网页上,还可以看到朱德在哥廷根留学的简介。“他是(哥廷根)学联的第二任主席。他向哥廷根的人们介绍中国,努力让德国人理解和支持中国革命。”

这是今日的留学生介绍自己的母校时必谈的故事。中国哥廷根学联主席王佳爱说,在学生活动中总是会提及朱德的故事,他一直在激发着留学

生爱国、报国的情怀。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名誉院长、汉学家余德美有多篇论文专研中共在德的早期革命者,她告诉记者,在今日孔子学院的课堂中也会涉及这些中国革命者在德国、在欧洲的内容,这是中国革命珍贵的历史片段。

余德美说,朱德留学期间是德国魏玛政府时期,各种政治思潮在德国激烈碰撞。通过在德国的学习生活,朱德了解了当地政治组织的斗争策略、宣传技巧以及一些德国军队的相关知识,这对她日后的革命生涯有不小的影响。

德国柏林普鲁士协会名誉主席福尔克·哈普克说,朱德留学时是上世纪20年代,中国积贫积弱,在世界舞台没有什么地位,正是如朱德一般的革命者一代一代奋斗,成就了新中国,成就了今天富强的中国。“他们在把一个国家向前推进。”

(记者张远、任珂、张毅霖、单宇琦、连振) 新华社德国哥廷根5月12日电

# 『就像家人久别重逢,真好』

## 法国蒙达尔纪市市长畅谈与中国“复联”

新华社法国蒙达尔纪5月12日电(记者刘芳)

在距法国首都巴黎100多公里的小城蒙达尔纪(又译蒙塔日),一座“工”字造型的群像浮雕矗立在火车站前的“邓小平广场”上,呈现着百年前胸怀救国梦的中国先辈们赴法求学的风采。

在蒙达尔纪市市长伯努瓦·迪容眼中,“这座雕塑在讲述历史:一个世纪初,中国各省份最优秀的学生、中国知识界最杰出的人物来到法国,寻找祖国进步之路。”

2019年5月,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百年之际,迪容曾主持这座名为《百年丰碑》的大型雕塑的安放仪式。

1919年,一群年轻中国学子从上海登船赴法,拉开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序幕。此后10年间,一批批有志青年远渡重洋,学习新思想、新知识,寻找民族救亡之路。蒙达尔纪是他们在法国学习工作的重要聚集地,邓小平、蔡和森、陈毅、李富春、蔡畅等数百人曾在这里求学求知,并逐渐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蒙达尔纪市政府所在的建筑,正是昔日中国青年就读的男子公学。迪容从市长办公室陈列台取下他所珍爱的《百年丰碑》雕塑模型,对记者慨叹:“想想他们的贡献,再看看他们来到这儿的时候那么年轻……”

在他看来,“通过阅读西方文献、阅读马克思著作,可能也通过接触本地居民和当地工厂,这些年轻人找到了共产主义,有了自己的主张,随后投身于中国共产党。”

遥想胸怀救国梦的中国青年,细数一个世纪的中国发展,迪容说中国如今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取得了巨大进步”。

迪容反复提及,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也让蒙达尔纪市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百年丰碑》雕塑就是蒙达尔纪与中国友谊的见证。他说,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历史档案陆续“出土”,蒙达尔纪与中国也日益“复联”,“就像家人久别重逢,真好”。

在迪容之前任蒙达尔纪市长十余年的让-皮埃尔·多尔同样珍视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他告诉记者:“历史不可无视,而是要经常回顾、反思,从中寻觅智慧的印记。”

多尔任市长期间,蒙达尔纪市开辟了红色旅游路线“伟大的足迹”,供游客探访当年勤工俭学中国学生走过的路。2014年,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市议会全票通过决定,将火车站前广场命名为“邓小平广场”。2016年,市中心一栋曾是昔日中国勤工俭学青年寓所的老宅成为纪念馆。

多尔现为法国国民会议员,并任议会法中友好小组副主席。他特别支持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纪念馆开展的活动,尤其希望年青一代学史知史,坚信法中两国应该继续深入交流。

迪容同样期待拓展与中国的合作。他告诉记者:“我们希望,疫情过后,中国游客能够重新来到蒙达尔纪。目前,百余名蒙达尔纪年轻人正在努力学习中文,希望他们有机会访问中国,为法国带回创新的理念。”